

诠释

帝王治世绝学

李凤飞 张大生 编著

帝王治世绝学



西苑出版社

帝王治世金

李凤飞 张大生 编著

帝王治世绝学



西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资治通鉴/李凤飞,张大生主编. -北京:西苑出版社,2010.5

(诠释)

ISBN 978-7-80210-734-2

I. ①资… II. ①李… ②张… III. ①中国-古代史-编年体
②资治通鉴-注释③资治通鉴-译文 IV. ①K204.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86734号

诠释——资治通鉴

编 著 李凤飞 张大生

出版发行 西苑出版社

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阜石路15号

邮政编码:100143

电 话:010-88624971

传 真:010-88637120

网 址 www.xycbs.com

E-mail: xycbs8@126.com

印 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字 数 150千字

印 张 13

版 次 2010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10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10-734-2

定 价 23.50元

(凡西苑版图书如有缺漏页、残破等质量问题,本社邮购部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第一章 《资治通鉴》与从政伦理诠释

- 第一节 官德的基本内容 3
- 第二节 官德典范——高允其人 13
- 第三节 官德沦丧——元载之死的鉴戒 17

第二章 《资治通鉴》与决策艺术诠释

- 第一节 古代决策与现代决策的基本特征 25
- 第二节 正确决策的基本经验 30
- 第三节 非常规决策 34

第三章 《资治通鉴》与用人思想诠释

- 第一节 人才与治乱成败 43
- 第二节 识别人才 46
- 第三节 使用人才 58
- 第四节 人才陷阱 85
- 第五节 人才悲剧 89

第四章 《资治通鉴》与领导方法诠释

- 第一节 策略艺术 97
- 第二节 赏罚艺术 105

第三节 纳谏艺术	111
----------------	-----

第四节 军事艺术	117
----------------	-----

第五章 《资治通鉴》与治家教育诠释

第一节 家与政	125
---------------	-----

第二节 帝王家庭	131
----------------	-----

第三节 官宦家教	136
----------------	-----

第六章 《资治通鉴》与治国从政思想诠释

第一节 民本思想	145
----------------	-----

第二节 教化治国思想	153
------------------	-----

第三节 法制思想	158
----------------	-----

第四节 廉政思想	164
----------------	-----

第五节 反奢倡俭思想	171
------------------	-----

第七章 《资治通鉴》与从政误区防范诠释

第一节 权力误区	179
----------------	-----

第二节 决策误区	186
----------------	-----

第三节 用人误区	190
----------------	-----

第四节 赏罚误区	198
----------------	-----

第一章

《资治通鉴》 与从政伦理诠释

资治通鉴

1

第一节 官德的基本内容

官德,即做官的道德,它是做官的一种最基本最重要的素质。我们现在所说的“德、智、体”,就是把人的素质分为道德方面的、智能方面的和生理方面的。做官的人道德方面的素质就是官德。现代中国的“官”,从理论上来说是人民的公仆,为了与古代统治老百姓的官相区别,不叫“官”而叫“领导”。那么现代领导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基本素质呢?夏禹龙等著《领导科学基础》是中国最早的一本领导科学著作,这本书提出了如下四个方面的基本素质:自知之明,创新精神,决断魄力,宽容精神。其中的第四个方面可以说是涉及了“官德”的内容。

《资治通鉴》载有丰富的关于做官基本素质的史事和论述,其中论述得最多、最精彩的是官德。《资治通鉴》认为,在德才能勤等基本素质中,最重要的是德。卷第一在记载智伯之死时,司马光对德与才的关系问题发了一篇很长的议论:“智伯之亡也,才胜德也。夫才与德异,而世俗莫之能辩,通谓之贤,此其所以失人也。夫聪察强毅之谓才,正直中和之谓德。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云梦之竹,天下之劲也,然而不矫揉,不羽括,则不能以入坚;棠溪之金,天下之利也,然而不熔范,不砥砺,则不能以击强。是故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

人。何则？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挟才以为善者，善无不至矣；挟才以为恶者，恶亦无不至矣。愚者虽欲为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胜，譬之乳狗搏人，人得而制之。小人智足以遂其奸，勇足以决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为害岂不多哉！夫德者人之所严，而才者人之所爱。爱者易亲，严者易疏，是以察者多蔽于才而遗于德。自古昔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余而德不足，以至于颠覆者多矣，岂特智伯哉！”

这段关于德才关系的论述，它的中心论点就是：德重于才。德是统领才的，没有德，才就不能用于正道；有才无德，才就会成为作恶的挟持。因此在无德无才的愚人与有才无德的小人之间选择，宁可用愚人而不可用小人，因为小人为非作歹起来会使人防不胜防。把德提到重要位置还因为存在人们认识方面的原因，看一个人，总是严其德而爱其才，严疏爱亲。因此，总是被一个人的才所蔽惑而忽略了他的德行。最后，司马光归结到智伯因缺德而死的问题上来，他说，才有余德不足落得个可悲下场的，历史上多得很，何止一个智伯呢！

此后，司马光或引述或论赞，反复论述了德重于才的思想。卷第十七记述董仲舒的对策：“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这是说君主要以德治天下，正心修德是政治的根本。卷第一百四十一记述魏主告诫臣下的话：“作牧亦易亦难。‘其身正，不令而行’，所以易；‘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所以难。”这里是说做官的难与易主要是看自身正不正，有德还是无德。

司马光主张德重于才，主张有才无德的人不能用。在《资治通鉴》里他记述了许多因德行亏损丢了乌纱帽被罢斥不用的史事。

卷第五十五载汉时黄允：“以俊才知名，泰见面谓曰：‘卿高才绝人，足成伟器，年过四十，声名著矣。然至于此际，当深自匡持，不然，将失之矣！’后司徒袁隗欲为从女求婚，见允，叹曰：‘得婿如是，足矣。’允闻而黜遣其妻。妻请大会宗亲为别，因于众中攘袂数允隐匿十五事而去，允以此废于时。”其他还载有唐时三品官李义琰为改葬父母，逼迫舅氏迁坟而被唐高宗罢了官：“义琰倚势，乃陵其舅家，不可复知政事！”（卷第二百三）

当然，《资治通鉴》强调德重于才并没有否定才，相反，它对许多有才的官员是肯定的，称道的，对那些无才的官员是贬斥的。如卷第二百一记载了唐高宗李治至濮阳，他问骑着马随行的窦德玄：“濮阳谓之帝丘，何也？”德玄回答不出。这时许敬宗跃马而前曰：“昔颡项居此，故谓之帝丘。”高宗说：“大臣不可以无学，吾见德玄不能对，心实羞之。”

凡是有为的英明的用人者，无论古今中外都是视德重于才的。古代英明的用人者如曹操也曾发过“唯才是举”的求贤令，但其所谓“唯才”是有前提的，这就是政治上对自己绝对忠诚。忠，这实际上就是最根本的官德。在社会主义中国，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历来也是视德重于才的，在“红”与“专”的关系上，总是认为“红”是第一位的。毛泽东、周恩来以及其他老一辈革命家对此都有过许多论述。现实政治生活中，特别是当今建立市场经济的社会实践中，许多正反方面的事实都说明了用人必须把德摆在第一位。这一点，已经屡屡被改革中一些地方用那些无德的“能人”所造成的惨重损失所证实。我们现代的领导科学在研究领导者的基本素质时，仅把宽容作为德的基本条件是远远不够的。改革中许多领导实践事实都说明了现代领导科学要加强对“官德”即对现代领导者道德素质的

研究。当前用人问题上的诸多失误,与这方面的研究不够分不开。

官德,是调整人们之间以及个人和社会之间关系的一般道德在政治中的体现,是一种职业道德。凡职业都以特定的方式与社会发生联系,都有其自身特点。因此,职业道德因职业与社会的独特的联系方式和个别特征也都具有不同的行为规范。官,这一政治职业,他与社会的联系方式和自身职业特征,决定了他的职业道德即官德的特殊内容。分析《资治通鉴》这部为官提供借鉴的史著,他所展示的官德即做官的行为规范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1. 忠君。《资治通鉴》把忠君视为官吏最根本的政治行为规范,卷第一就开宗明义地写着:“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何谓礼?纪纲是也;何谓分?君臣是也……文王序《易》,以乾坤为首。孔子系之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言君臣之位,犹天地之不可易也。”中国古代社会是家天下的宗法社会,“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天尊地卑,君尊臣卑,官吏对君主绝对忠诚因此成了最根本最重要的官德。《资治通鉴》在记载那些忠君名臣的事迹时,字里行间洋溢着褒扬。如在卷第二十三记载李陵受匈奴单于之托去劝降苏武,苏武严辞拒绝:“臣事君,犹子事父也;子为父死,无所恨。愿勿复再言。”陵见其至诚,喟然叹曰:“嗟乎,义士!陵与卫律之罪上通于天!”“后陵复至北海上,语武以武帝崩,武南乡号哭呕血。”

忠君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政治概念,它具有实实在在的具体内容。《资治通鉴》认为,忠君必须敢于直言。卷第三十一记载谷永上书汉成帝:“臣闻王天下、有国家者,患在上有危亡之事而危亡之言不得上闻。如使危亡之言辄上闻,则商、周不易姓而迭兴,三正不变改而更用。夏、商之将亡也,行道之人皆知之。晏然自以若天有

日,莫能危,是故恶日广而不自知,大命倾而不自寤。”君主能不能听到真话,能不能了解到真实情况,关系王朝存亡。忠君必须敢讲真话,敢于反映真实情况。《资治通鉴》记载了像高允、韩歆、魏征等许多敢讲真话的官吏,为后世从政之人树立了敢于直言的道德楷模。

《资治通鉴》认为,忠君必须敢于直谏。君主有了过失,臣下应该谏告,使君主改正和补救过失以维护其政治统治。唐太宗曾向臣下提出过这方面的要求,贞观三年(公元629年),他曾对臣下说,如果我的诏令有什么不当的地方,你们都要如实地指出来,近来我只听到顺从的话,没听到谁对诏令提出过不同意见。如果你们只是行文书,这样的事谁不会做呢(卷第一百九十三)?对于敢于直谏之臣,《资治通鉴》褒奖之。如魏征是一个敢于直谏的名臣,《资治通鉴》记载他数十次纠正唐太宗的过失。魏征逝后唐太宗曾悲痛地说:“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征没,朕亡一镜矣!”(卷第一百九十六)而对于那些虽有才能却不敢直谏的官吏,《资治通鉴》则是贬斥之。如东汉灵帝时太傅胡广是一个极有才能的人,他“练达故事,明解朝章”,京师有民谚说:“万事不理,问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但之后笔锋一转,说他“常逊言恭色以取媚于时,无忠直之风,天下以此薄之”(卷第五十七)。《资治通鉴》认为,忠君,必须忠而忘私。敢于直言直谏,要忘身忘家。魏征直谏,就连纳谏如唐太宗者也曾发怒说:“会须杀此田舍翁”(卷第一百九十四)。可见直言直谏是要冒生命危险的。三国时司徒董寻谏魏明帝曾言:“天生忠直,虽白刃沸汤,往而不顾者。……臣知言出必死……秉笔流涕,心与世辞。”奏章将上,“沐浴以待命”(卷第七十三)。也就是说在上进谏

的奏章前就作好了死的准备。当个人利益与君主家天下利益发生矛盾的时候,为了国家君主的利益也要忘身忘家。所谓忠孝不能两全,说的正是要舍孝尽忠。《资治通鉴》记载了像东汉张苞那样母妻被人质仍奋力破敌舍亲尽忠的事迹(卷第五十七)。

2. 爱民。君是统治者,民是统治对象,君与民的关系决定了封建官吏忠君必须爱民。君的统治必须以民心为基础,《资治通鉴》从不同角度阐述了这一思想。卷第三十八载西汉末年王常说将帅:“王莽苛酷,积失百姓之心,民之讴吟思汉,非一日也,故使吾属因此得起。夫民所怨者,天所去也;民所思者,天所与也。举大事,必当下顺民心,上合天意,功乃可成。”这是说天意与民意是一致的,失去民心,君就会失去天意。这是从天命的角度。卷第七十九载太傅贺邵上疏吴王:“国之兴也,视民如赤子;其亡也,以民为草芥。”这是说历史的经验证明,凡兴旺的王朝必是官爱民如子,凡危亡的王朝必是官残民害民。这是从历史的角度。卷第二百五十二载翰林学士卢携上书唐僖宗:“国家之有百姓,如草木之有根柢,若秋冬培溉,则春夏滋荣。”把民比作草木的根基,国家要兴旺,就必须爱民,培植根基,这是从比喻的角度。君对民的统治是通过各级官吏实现的,君要得民心,离不开各级官吏的政治活动,各级官吏只有爱民才能得民心,才能为君权建立广泛的社会基础。

爱民不仅是忠君这一根本政治行为规范的题中之意,同时也是官吏政治的必然要求。官只有爱民才能化民。卷第五十二载,东汉顺帝时胶东相吴佑是一个爱民的好官,有一个叫孙性的啬夫,私赋民钱为他的父亲制衣服,他的父亲怒斥他:“有君如是,何忍欺之!”命他向吴佑自首认罪。在吴佑为相期间,胶东民风大化。官只有爱民,才能获得拥戴,才能有好的官声以利施政。在中国古代,民谣是

评价官吏的重要方式,所谓“劝君不用镌顽石,路上行人似口碑”。只有那些爱民的好官,才能受到民谣的称颂。东汉章帝时,蜀郡成都房屋拥挤,为防火灾禁止百姓夜晚劳作。建初六年(公元81年),武都太守廉范任蜀郡太守,为使百姓致富他取消了旧令,只是叫百姓储水作好晚上救火的准备。百姓歌颂他说:“廉叔度,来何暮。不禁火,民安作。昔无襦,今五绔”(卷第四十六)。东汉灵帝时,交趾多珍货,历代刺史都是横征暴敛,待填满腰包后就调走了事,逼得百姓经常造反。光和六年(公元183年),贾琮任交趾刺史,他整顿吏治,轻徭减赋,不到一年时间,就使百姓安定下来了。巷路为之歌曰:“贾父来晚,使我先反;今见清平,吏不敢饭”(卷第五十八)。官也只有爱民才能爱身。《资治通鉴》记载了爱民、残民两个官员受到百姓不同对待的事。东汉献帝建安六年(公元201年),袁尚遣河东太守郭援进攻河东郡绛城,守吏贾逵是一个爱民的好官。城将被攻破,百姓以保障贾逵的人身安全为条件投降。后郭援强制贾逵为将遭到拒绝,郭援要杀贾逵。“绛民吏闻将杀逵,皆乘城呼曰:‘负约杀我贤君,宁俱死耳。’”郭援不敢杀他,把他关在土窖中,贾逵在窖中呼救:“此间无健儿邪,而使义士死此中乎?”贾逵的呼救声被一姓祝的百姓听到,当晚就把他救出来而不肯说出姓名(卷第六十四)。而唐懿宗时陕观察使崔尧是一个不顾百姓死活的恶吏,咸通十年(公元869年)陕大旱,百姓向他诉说旱情,他指着官邸庭树说:“此尚有叶,何旱之有!”并刑杖诉旱的百姓。陕民被激怒,作乱,驱逐崔尧。崔尧逃到一个老农家里讨水喝,“民以溺饮之”,也就是那个老农给他喝了一壶尿(卷第二百五十一)。

3. 公正。要保证官吏的政治行为沿着有利于阶级、有利于社会的轨道,制定规章制度是一个方面;但只有规章制度是不够的,还

必须有规章制度的执行者即官吏的公正执政的官德。因为任何职业要求都是以职业道德来保证的,做官这一职业也不离外。《资治通鉴》在卷第七十三评论说:“为治之要,莫先于用人,而知人之道,圣贤所难也。是故求之于毁誉,则爱憎竞进而善恶混淆;考之于功状,则巧诈横生而真伪相冒。要之,其本在至公至明而已矣。为人上者至公至明,则群下之能否焯然形于目中,无所复逃矣。敬为不公不明,则考课之法,适足以为曲私欺罔之资也。何以言之?公明者,心也;功状者,迹也。己之心不能治,而以考人之迹,不亦难乎?”这里的意思是说,用人的规章制度如考课法之类,虽然也重要但最根本最重要的还是用人者要至公至明,如果用人者不公不明,那么规章制度就会被歪曲被利用。司马光在此还认为,像京房、刘邵等人只注意考课之法而忽视对官吏的官德教育,那是“不得其本而奔趋其末”。

公正首先要出以公心,在政治活动中要以维护阶级和社会的利益为出发点,而不能掺和私心。《资治通鉴》褒扬了许多这样的官员:卷第二十五载西汉宣帝重臣张安世“尝有举荐,其人宋谢,安世大恨,以为举贤达能‘岂有私谢邪!’”有一个郎官功高不得升迁,找到张安世自诉。张安世当着他的面说他不应该自诉于人,但在皇帝面前却推荐了他,不久这个郎官就得到了升迁。西汉成帝时的孔光也是“有所荐举,唯恐其人之闻知”(卷第三十一)。晋武帝时的羊祜“所进达之人皆不知所由。常曰‘拜官公朝,谢恩私门,吾所不敢也’”(卷第八十)。

公正是一种施政道德,而用人、执法、赏罚是施政的主要内容。要公正,这些方面应公应明。一般来说,对于与自己无瓜葛的普通人,做到公正是比较容易的;但对于自己的上级、自己的亲友、自己

的仇隙要做到公正就比较难了。《资治通鉴》正是通过记载法不阿贵、用人不避亲不避仇、赏罚严明不分亲疏等事迹来对公正官员进行彰扬以倡导后世。唐中宗神龙二年(公元706年),权势熏天的太平公主与僧寺争碾硿,雍州司户李元纁判归僧寺(卷第二百八)。有的公正官员,他们公正执法不但敢于触犯皇亲国戚,甚至连皇帝本人也敢触犯。

五代周世宗时,周行逢为武平节度使,女婿唐德求岳父给个官做。周行逢说,你不是做官的料,如果给你官做你做不好,那时我又不能枉法救你,亲戚之恩就断绝了。于是给了他一条耕牛和全套农具,让他回家种地去了(卷第二百九十三)。圣历元年(公元698年),武则天命宰相每人推荐一个尚书郎,狄仁杰推荐了自己的儿子而很称职,武则天称赞他:你真是举人不避亲的祁奚!(卷第二百六)“萧规曹随”这是著名历史故事,但萧何所荐代自己为相的曹参,正是与萧何有隙之人(卷第十二)。这是举人不避仇隙和虽亲无才不用、有才举不避亲。陈寿的父亲受过诸葛亮的严厉处罚,但他却高度评价诸葛亮至公至明:“诸葛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诫明也”(卷第七十二)。这是赏罚严明不避亲疏。

4. 廉洁。就像忠君必然要求爱民一样,公正也必须以廉洁来保证。公必须明,《资治通鉴》卷第二十九记载着荀子的一段话说,真是公正的前提和主要内容,因为“德必核其真,然后授其位;能必核其真,然后授其事;功必核其真,然后授其赏;罪必核其真,然后授其刑”。由于人事难知,即使主观上要公正要明察,有时也难免造

成客观上的不公不明,更何况如果官员不廉洁而在主观上背弃了公正呢!正是由于廉洁对于公正的保证作用,所以廉洁自古就是官德的重要内容。因此,我们看到舞台上古代官吏公案上总是高悬着“公正廉明”四个大字;并且历代统治者都把廉洁作为用人的重要依据。如唐穆宗时,韩弘行贿事发,簿上记着谁受钱多少,只有一行旁边另附着几个朱红小字:“某年某月,送户部牛侍郎钱千万,不纳。”穆宗见后大喜,高兴地对左右说:“果然,吾不缪知人!”不久就把牛僧儒提升为中书侍郎(卷第二百四十三)。

《资治通鉴》虽然也记载了许多廉吏以倡导廉洁,如在卷第五十九记载“四知先生”杨震夜不受金,他对送金人说: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怎么能说人不知?在卷第五十四记载了“一钱太守”宠常,宠常做会稽太守,会稽大治,提升为将作大匠。临别时,百姓赠送百钱以示感戴,宠常只“选一大钱受之”。但是,《资治通鉴》更多的是通过对贪官污吏的批判来说明廉洁对于政治的重要。

古代的官和现代领导者,虽然阶级性质不同,但在治理国家与社会这一点上又是共同的。也正是因为如此,古代的政治经验才有了能够为现代政治所借鉴的基础。《资治通鉴》从“忠君、爱民、公正、廉洁”四个方面对官德进行概括是很符合为官从政者治理国家与社会这一职业特征的,是恰当的、中肯的。除了把忠君换成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社会主义事业以外,其他爱民、公正、廉洁都可以作为今天领导者必须具备的基本道德素质,只不过应该赋予他们符合时代和符合人民利益的新内容。